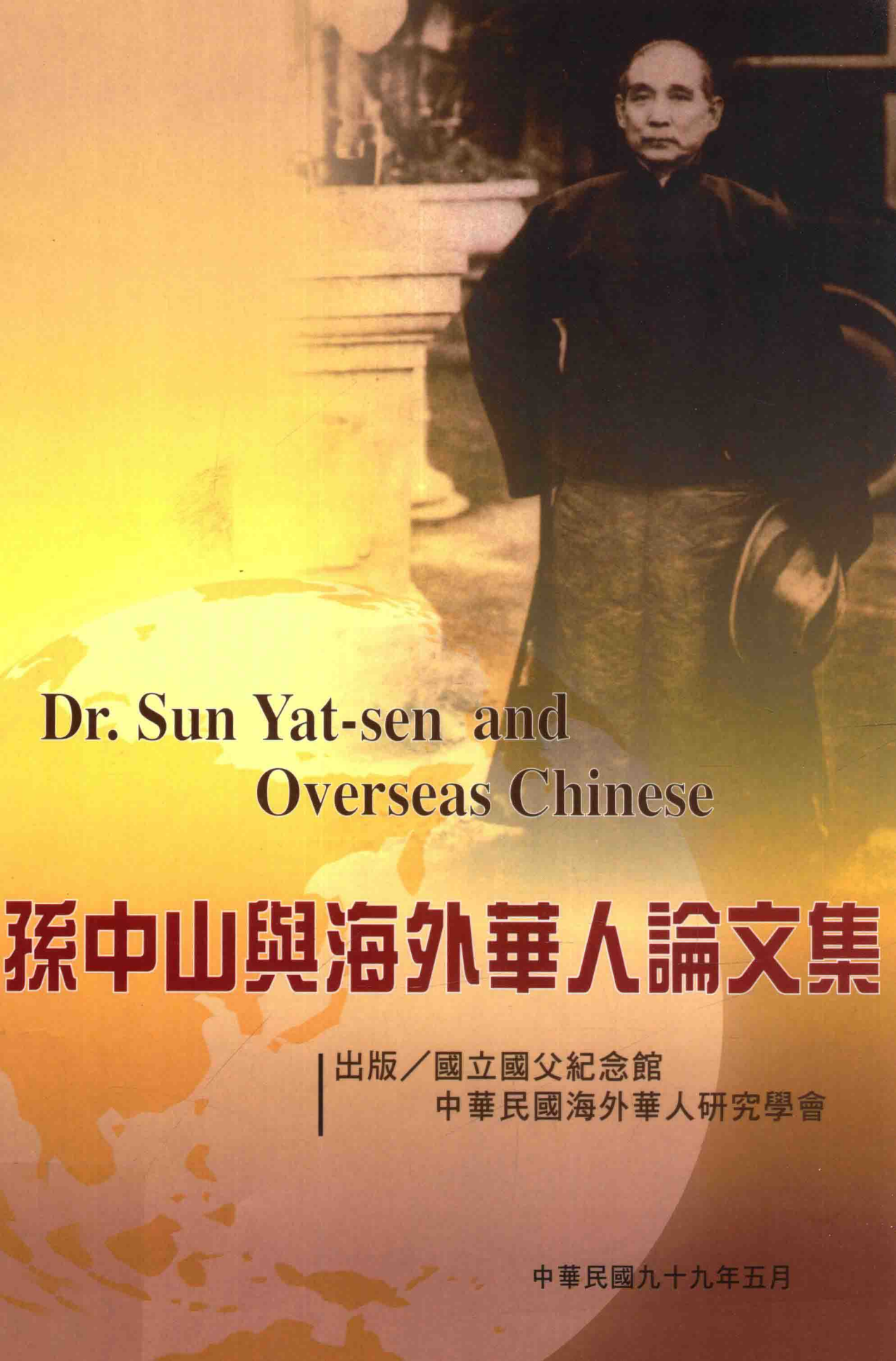




Dr. Sun Yat-sen and
Overseas Chinese

孫中山與海外華人論文集

出版／國立國父紀念館
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



Dr. Sun Yat-sen and Overseas Chinese

孫中山與海外華人論文集

出版／國立國父紀念館
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孫中山與海外華人論文集／湯熙勇、顏妙幸編輯
--初版 --臺北市：國父紀念館，海外華人學會，
2010.05

面：公分

部分內容爲英文

ISBN 978-986-02-3698-9 (平裝)

1. 華僑 2. 孫中山思想 3. 文集

577.207

99009858

孫中山與海外華人論文集

編輯：湯熙勇、顏妙幸

發行者：國立國父紀念館、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1) 110 臺北市仁愛路 4 段 505 號 國立國父紀念館

電話：(02) 2758-8008

電子郵件：sun223@yatsen.yatsen.gov.tw

網址：<http://www.yatsen.yatsen.gov.tw/>

(2) 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

電話：(02) 2789-8122

電子郵件：tang@gate.sinica.edu.tw

印刷：易風格數位快印有限公司

115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39-4 號

出版日期：2010 年 5 月 初版一刷

展售處：五南文化廣場台中總店

40042 臺中市中山路 6 號 電話：886-4-22260330

國家書店

10485 台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62-2-2518-0207

ISBN：978-986-02-3698-9

GPN：1009901791

定價：新臺幣 300 元正整

※ 非經作者同意，請勿轉載刊行

本論文集版權屬於國立國父紀念館、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共同所有 ISBN

編者序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以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等相關理論來檢視移民活動的內涵及意義，已經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及反省。基於對移民研究及華人與中國的關係等議題重要性之體認，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與國立國父紀念館，邀請相關之學者專家，討論編輯以孫中山先生與移民為內涵之專書；其後，經過匿名審查程序，獲得推薦刊登共有16篇論文，再由作者根據匿名審查之結果進行修改，符合學術論文及專書出版之規範，彙編成論文集。

本論文集所收之16篇學術論文，以孫中山先生與海外華人為核心議題，分別從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及地理學等不同學科的角度與觀點，探討孫中山先生的活動及海外華人對其追尋民主理想之反應，並以馬來西亞、美國及巴西、日本之華人為對象，分析華僑政策與移民過程，以及跨國移民所關心之民族主義、政治參與、文化發展與再現、族群聚落等現象。

這16篇論文的作者，分別來自於東南亞、中國大陸及臺灣等地，目前任教職或從事研究工作於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國立中興大學、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國立國父紀念館、東海大學、中原大學、淡江大學、中央研究院、玄奘大學等，專注於華人研究領域，且均有專著或專論出版。這16篇論文，除了論文題目涵蓋面廣泛、議題具有創新性外，論文內容分析亦具獨到之處，值得研讀，可提供有興趣之學者專家及學生之參考。

在本論文集編輯期間，匿名審查人之細心，及論文作者之認真修改，令編者印象深刻，銘感於心。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及海華文教基金會等，在審查及出版經費上，全力提供協助，則是促使本論文集出版之最大助力。在本論文集出版之前夕，對16位提供論文的作者，以及支持本論文集出版之僑務委員會、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玄奘大學歷史系、華僑救國聯合總會、華僑協會總會、海華文教基金會及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等相關機構，謹此深致謝忱。此外，對本論文集之編輯及出版直接、間接賜予協助者，以及國立國父紀念館提供英文目錄，一併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編輯 湯熙勇

顏妙幸

中華民國99年5月

目 錄

編者序.....	湯熙勇 顏妙幸	i
Foreword.....	Shi-Yeoung Tang Miao-Hsin Yen	
孫中山與檳榔嶼僑社.....	張曉威	1
Dr. Sun Yat-sen and Pulau Pinang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Siou Wei Chong	
從史蹟追尋孫中山民主革命之夢.....	朱浚源	15
Tracing to Dr.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Dream from His Relics.....	Hong-Yuan Chu	
孫中山與星馬僑社.....	高崇雲 高欣	45
Dr. Sun Yat-sen and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un-Yun Kao Sin Kao	
第一屆全球僑務會議始末.....	夏誠華	61
Record on Initial Global Overseas Chinese Conference.....	Chen-Hwa Hsia	
英屬馬來亞華僑民族主義初探.....	古鴻廷	93
Discuss on Nationalism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Colonial Period of Malaysia.....	Hung-Ting Ku	
獨立時期馬來西亞華人的政治參與及其影響.....	張應龍	105
Overseas Chines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Influence in the Independence Period of Malaysia.....	Yinglong Zhang	
海外華人與中華文化的考察—— 以2009年大馬「全國華人文化節」為例.....	黃建淳	115
A Survey on the Chinese Culture Festivals in Sarawak Malaysia 2009.....	Jiann-Chen Huang	
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的發展——留臺人的角色.....	王介英	131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of Malaysia-- The Role of Overseas Malaysia in Taiwan.....	Kay Song Heng	

馬來西亞華人與海峽兩岸的關係：

從留臺聯總及留華同學會爭議為例案觀察..... 黃文斌 14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in Malaysia
and Taiwan Cross-strait..... Wun Bin Wong

馬來西亞韓江中學初探..... 曹淑瑤 157

Discuss Han-Jiang Junior High School..... Shu-Yao Tsao

海外華人文化傳習的環境—以漢字書法藝術為例..... 林國章 171

Cultural Heritage Environ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As an Example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Kuo Chang Lin

美國最古老的華人村鎮—樂居鎮..... 陳靜瑜 185

The Oldest Villag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America..... Chin-yu Chen

集體記憶與文化地景—

談洛杉磯臺灣移民的族群聚落與族裔地景..... 徐榮崇 209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Landscape--
Discuss on National Tribe and Racial Landscape of
Taiwan Emigrant of Los Angeles..... Jung-Chung Richard Hsu

從臺灣到巴西：巴西臺灣人「六家莊」的建立

及其相關活動（1963-1972）..... 湯熙勇 227

From Taiwan to Brazil: Establishment of the Taiwanese's
“Six Family Manor” in Brazil（1963-1972）..... Shi-Yeoung Tang

Opening the Kobe Port to Foreign Trad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Japan..... Kagotani Naoto 241

1923年關東大地震災後日人虐殺華人事件..... 黃文德 257

Japanese ill-treat Chinese after Great Kantō Earthquake in 1923..... Wen-De Huang

孫中山與檳榔嶼僑社

張曉威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摘 要

孫中山曾讚譽「華僑為革命之母」，而南洋地區的華人在此方面的貢獻相當值得注意。因為自1906年以後，孫中山以下各主要革命黨領袖，不僅以此地作為僑居之所，甚至亦在當地成立同盟會的分會，而且往後多次規模較大的反滿起義行動，其人力與財力的支援，也幾乎與此地區的僑社有關。由此觀之，從「武昌起義」的爆發到1912年滿清皇朝的結束，以及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的誕生，實與南洋華人脫離不了關係。其中新加坡和檳榔嶼的華人在此方面深具代表性。不過，關於此方面的研究，長久以來多半偏重於新加坡，至於檳榔嶼方面則相對不足。事實上，與新加坡同屬英國殖民統治的檳榔嶼，當地華人參與革命運動的熱誠不亞於新加坡，甚至在革命運動晚期時，其地位就益顯重要。在同盟會南洋支部遷往檳榔嶼之後，更顯現出檳榔嶼華人在辛亥革命運動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關鍵詞：檳榔嶼、檳城、孫中山、辛亥革命、海外華人

一、前言

孫中山曾讚譽「華僑為革命之母」，而南洋地區的華人在此方面的貢獻相當值得注意。因為自1906年(光緒32年)以後，孫中山以下各主要革命黨領袖，不僅以此地作為僑居之所，甚至亦在當地成立同盟會的分會，而且往後多次規模較大的反滿起義行動，其人力與財力的支援，也幾乎與此地區的僑社有關。由此觀之，從「武昌起義」的爆發到1912年滿清皇朝的結束，以及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政體的誕生，實與南洋華人脫離不了關係。其中又以當時受英國殖民統治的新加坡和檳榔嶼深具代表性。不過，長久以來關於此方面的論述與關注點，多半偏重於新加坡方面，而檳榔嶼方面則略顯不足。¹

事實上，檳榔嶼在辛亥革命運動史上的地位，並不亞於新加坡，甚至在革命運動晚期，其地位益顯重要。尤其1910年(宣統2年)同盟會南洋支部從新加坡遷往檳榔嶼之後，即反映出當地華人在辛亥革命運動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當中又以「檳榔嶼會議」(亦稱「庇能會議」或「檳城會議」)的召開，以及策劃革命黨最激烈的「廣州三二九起義」(即日後所稱的「黃花崗之役」)等，在在凸顯出檳榔嶼與中國革命運動的關聯性。換言之，檳榔嶼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而言，實居於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將透過田野調查及《檳城新報》等材料的輔助，嘗試處理前人未及論述之處，藉此一窺孫中山與檳榔嶼僑社的關係，以及檳榔嶼僑社對辛亥革命運動的反應。

二、同盟會檳榔嶼分會的設立及其地位的轉變

由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其在海外的革命組織，大部分都設在華人較多的區

¹ 學術界有關辛亥革命運動且直接涉及檳榔嶼研究的著作並不多見，除了顏清湟「Penang Chinese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以及程光裕〈檳榔嶼僑賢陳新政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兩文，大概就屬張少寬在2004年所出版的《孫中山與庇能會議：策動廣州三、二九之役》一書了。顏氏該篇論文係以作者的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中譯本為《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為基礎，而再增補和擴大所完成，程氏一文則偏重在梳理檳榔嶼僑賢陳新政與孫中山的互動。至於張氏一書，則係作者將其所發表在報章上的文章，經過整理而結集成冊。不過，關於此一課題，近年來似乎已開始引起關注。例如，馬來西亞孝恩基金會、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檳城分會與馬來西亞華族歷史文物暨資料調查檳城工委會，即以「辛亥革命與檳城」為主題，而在2001年主辦了一次學術的研討會。該會議討論的特色，則係偏向於探討孫中山的個人革命事業為主，例如孫中山在檳榔嶼落腳處的考定、史跡的保存、孫中山三民主義理念在檳城的傳播等。Yen Ching Hwang, "Penang Chinese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41, Pt.1&2, (1986), pp.63-78; 程光裕, 〈檳榔嶼僑賢陳新政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 收錄於張希哲、陳三井主編, 《華僑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 國史館, 1997), 頁433-449; 張少寬, 《孫中山與庇能會議：策動廣州三、二九之役》(檳榔嶼: 南洋田野研究室, 2004)。關於該場以「辛亥革命與檳城」為主題的研討會之詳情, 可參閱: <http://www.xiao-en.org/cultural/academic.asp?cat=64&loc=zh-cn>

域。因此，海外華人最集中及人數最多的南洋地區，儼然成為革命運動的重要據點之一。事實上，孫中山在南洋設立的第一個革命組織，即1906年(光緒32年)在新加坡所成立的中國同盟會分會。孫中山首次抵達新加坡，係在1900年7月9日(光緒26年6月13日)，此行的目的係爲了營救被康有爲「誣陷」下獄的宮崎寅藏和清藤幸七郎二人。²當孫中山抵步後，即尋求友人黃康衢(Huang Kang-chu)、吳傑模(Wu Tsieh-moh)和林文慶(Lim Boon Keng)等人出面協調，以期英屬海峽殖民地政府能釋放宮崎二人。³在幾經轉折之後，雖然宮崎等人終於獲得釋放，但是包括孫中山本人在內，卻被英屬海峽殖民地政府下令驅逐出境。⁴

由於新加坡地處南洋中心，以致擁有成為該地區革命樞紐的優良條件。無疑地，透過新加坡，革命의思想和訊息，將得以傳輸至南洋各地，尤其係英屬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等地區。因此，孫中山雖然在1900年7月(光緒26年6月)營救宮崎二人之後即離境，但是對於在新加坡推動革命事業的行動並沒有放緩腳步。1901年(光緒27年)更安排尤列前往新加坡活動，此舉不僅陸續吸引了當地青年華僑加入革命行業，甚至更奠定日後革命派在當地設立同盟會分會的基礎。⁵是故，當孫中山在1906年4月6日(光緒32年3月13日)抵達新加坡之後，在陳楚楠、張永福等人的迎接下，即前往已準備妥當的晚晴園，並在該處成立了同盟會分會，作為在南洋英屬和荷屬等地的革命總機關。⁶

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成立之後，孫中山即積極籌備在英屬馬來亞設立分會，其主要目的就是爲了在當地的僑社建立起革命組織，以作為全球性反滿革命的中國同盟會的一環。⁷由於與新加坡同屬英國殖民統治的檳榔嶼，其華人口數亦眾多，自然係另一個同盟會分會設立的理想地點。因此，自同盟會新加坡分會設立之後，孫中山隨即派出陳楚楠和林義順等革命同仁，從新加坡北上檳榔嶼增設同盟會分會。⁸經過兩年的發

² 劉世昌，〈中山先生與南洋〉，《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6)，頁50。不過，按張克宏的研究，無論有否發生該次的「刺康案」，孫中山其實早已計畫了該趟新加坡的行程。換言之，孫中山並非爲了要救宮崎才來，反而是當他抵步之後方知道宮崎等人被捕的消息。張克宏，〈康有爲在新馬〉(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8)，頁168。

³ 羅家倫主編，《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94年第四次增訂)，頁160-161；李勳圖，〈海峽政府對孫中山之態度(1900-1911)〉，《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論文集》，頁167。

⁴ 關於孫中山與二位日本友人離境的說法，中英雙方的資料略有不同的記載。按《國父年譜增訂本》和馮自由的記載，孫中山係被判「出境五年」，而宮崎等人則有「五年不得涉足英國海峽殖民地」或「永遠出境」的說法；至於英國殖民部檔案(即俗稱的C.O.檔)的紀錄，僅提及將宮崎二人驅逐出境五年而已，並沒有將孫中山驅逐出境的紀錄，只提及孫中山與宮崎兩人同日離境而已。詳見：羅家倫主編，《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161；馮自由，《革命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97；C.O. 273/257/20358 “Chinese Reform Party,” 26th July.1900。相關討論，亦可參閱：劉世昌，〈中山先生與南洋〉，頁50；李勳圖，〈海峽政府對孫中山之態度(1900-1911)〉，頁168。

⁵ 例如陳楚楠、張永福、林義順等人都是當時革命精神旺盛的青年，並且出資創辦《圖南日報》作為在新加坡宣傳革命思想的咽喉。歐陽昌大，〈新嘉坡華人對辛亥革命的反應〉，收錄於柯木林、吳振強編，《新加坡華族史論集》(新加坡：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1972)，頁95-96；劉世昌，〈中山先生與南洋〉，頁53。

⁶ 羅家倫主編，《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289；歐陽昌大，〈新嘉坡華人對辛亥革命的反應〉，頁92。

⁷ 顏清煌[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117。

⁸ 黃珍吾，《華僑與中國革命》(台北：國防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1963)，頁33；程光裕，〈檳榔嶼僑賢陳新政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頁434。

展，同盟會在南洋的分會已有廿餘處，會員亦眾多。爲了協調和更有效的在南洋推動革命運動，孫中山遂在新加坡設立同盟會南洋支部，派胡漢民爲支部長。⁹由此觀之，新加坡在革命運動上所扮演的角色或所處的地位，應該係無庸置疑的了。¹⁰

檳榔嶼，俗稱檳城，亦作庇能或碧蘭(即馬來文Pinang或英文Penang的音譯)等稱謂，¹¹位於馬來半島西北部，在1786年(乾隆51年)以前，是個尚未開墾的島嶼，時隸屬於馬來半島北部的吉打(Kedah)王國。然而，1786年(乾隆51年)英國人萊特(Francis Light)與吉打蘇丹簽訂條約後，英國人正式佔有了檳榔嶼，同時改變了其歷史的發展。透過英國人的統治與開發，使得原本幾近荒蕪的島嶼，逐漸發展成一個人口眾多的區域。¹²檳榔嶼位於馬六甲海峽的要衝，在位於馬來半島南部的新加坡尚未發展起來之前，檳榔嶼就已是該區域最佳的商港之一，有助於加快其發展的腳步。

自19世紀起，英國人爲了開墾馬來亞地區，亦陸續招徠許多中國籍的契約勞工，使得檳榔嶼華人口逐年增長，¹³導致許多社會問題逐一出現。因此，爲了幫助與照顧此批僑居檳榔嶼的中國子民，中國清政府甚至設法在當地設置副領事，以貫徹和執行上述的工作與任務。檳榔嶼的設領，是清政府在南洋所設的第二個領事館。¹⁴其目的即爲了維護當地中國僑民和華裔的利益，同時亦爲了管束僑民，以維持此批僑民對中國政府的效忠，從而加強他們與中國的聯繫，以免他們與中國聲息隔絕。¹⁵

事實上，當時中國領事的職責，尚包括號召華僑回國投資的重責。因爲中國清政府在1858年(咸豐8年)至1860年(咸豐10年)的兩次英法聯軍之役後，財政與經濟面臨重重危機，海外僑資的重要性就更爲凸顯，清政府對海外僑資的重視就越爲關注，而借資

⁹ 黨史委員會編訂，《革命文獻(第65輯)》(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委會，1973)，頁433；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第1編，第11冊(台北：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1963，第一版)，頁502、505。

¹⁰ 關於同盟會新加坡分會的成立和革命派在當地發展的論述，可參閱顏清煌[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頁110-162，以及歐陽昌大，〈新嘉坡華人对辛亥革命的反應〉，頁92-118。

¹¹ 檳榔嶼名稱的沿革，亦可參閱顧因明在《檳榔嶼開闢史》中的譯者序文。書蠹(Bookworm)編，顧因明、王旦華合譯，《檳榔嶼開闢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頁5-8；張曉威，〈晚清駐檳榔嶼副領事之角色分析〉(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5)，頁38-41；張少寬，《檳榔嶼叢談》(檳榔嶼：南洋田野研究室，2005)，頁1-5。

¹² 關於檳榔嶼開發的論述，可參閱書蠹(Bookworm)編，顧因明、王旦華合譯，《檳榔嶼開闢史》；姚楠、張禮千合著，《檳榔嶼志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再版)；許雲樵，《馬來亞近代史》(新加坡：世界書局，1963)，頁78-89。

¹³ 例如1820年，檳榔嶼的華人口只有8千餘人，佔當地總人口數的28%，但是到1851年時，華人口已增至1萬5千餘人，佔當地總人口數的35%，而華人口在1860年時，更增加至2萬8千餘人，佔當地總人口數近50%左右。詳見巴素(Purcell) [著]，劉前度[譯]，《馬來亞華僑史》(檳城：光華日報，1950)，頁4。

¹⁴ 中國清政府在南洋所設的第一個領事館，即新加坡領事館，此館亦是中國近代史上首設的領事館。張曉威，〈中國近代領事制度的建立：以清末在新嘉坡設置領事爲探討中心(1877-1891)〉，收錄於胡春惠、周惠民主編，《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香港：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珠海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1年12月)，頁318。

¹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郭嵩燾奏爲新嘉坡設領事及籌撥經費事片〉，《清代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一冊)，(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頁3。另一方面，據陳鴻瑜教授的研究分析，清末駐外領事館設立的原因，尚包括(一)保護華僑；(二)監視海外華人；(三)以明辨華夷之別；(四)聯繫海外華人與母國之關係。詳見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國家建立使領館關係之比較〉，《海華與東南亞研究》，2：4(2002/10)，頁13-14。

於海外華商，不但可以填補國庫的空虛，又能開展近代的經濟活動。爲此，清政府遂有放寬對私人投資近代企業種種限制的政策。同時，爲了能有效吸納海外華商資本，以作爲開辦近代經濟實業的資金，清政府甚至還將封官賜爵與投資興辦實業結合在一起，作爲吸引海外華僑富商的一種手段。¹⁶

由此觀之，檳榔嶼的設領，亦可說是間接受到晚清財政危機影響所致。關於此點，吾人亦可從當時挑選副領事人選中看出端倪。因爲遴選的結果，即以委任當地華商出任該職爲原則。¹⁷此種做法，不但可以拉攏與加強他們和祖國的關係，甚至在遊說其他華商參與祖國的事務時，亦更加具有說服力。¹⁸因此，檳榔嶼華人的重要性，在日益顯現出來之後，清政府遂比革命派人士在更早的時候，就已採取行動拉攏之。¹⁹同樣地，孫中山等人亦了解到其中的重要性，當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成立不久，即迅速派員北上檳榔嶼籌設當地分會。

同盟會檳榔嶼分會的成立，實獲得當地僑商的鼎力支持所致。其中，又以吳世榮、黃金慶、陳新政等人尤爲關鍵，而吳氏和黃氏更被推舉爲正副會長。²⁰在此批華僑商人的多番努力和號召下，逐漸帶動起當地華僑參與中國的革命運動。此外，同盟會在當地會務的順利發展，無疑爲設在新加坡的南洋支部於日後的北遷預留了一定的條件與空間。1910年(宣統2年)，同盟會南洋支部因爲新加坡的會務發展受阻，孫中山遂決定把南洋支部北遷至檳榔嶼。²¹此番決定，無疑將檳榔嶼僑社和近代中國的關係更拉近了一步。

孫中山決定將南洋同盟會的重心點北遷檳榔嶼，主要是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內部組織已陷入癱瘓狀態，加上清政府派駐新加坡的領事又多方打擊，以及英國海峽殖民政府日益加緊對革命黨人的監視，導致孫中山等人在新加坡的革命活動，無形中受到一股嚴重的打擊和阻礙。爲了重振革命黨人的士氣，以及延續反滿的革命事業，孫中山唯有尋覓適當地點，以代替新加坡的地位與功能。

至於同盟會新加坡分會組織的運作會陷入癱瘓，歸根究底，實受到孫中山與陶成

¹⁶ 關於此方面的討論，可參閱顏清湟，〈海外華人與中國的經濟現代化(1875-1912)〉，收錄於氏著，《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頁44-53。

¹⁷ 例如委任張弼士出任檳榔嶼首任副領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關於張弼士出任檳榔嶼副領事的原因和經過，可參閱：張曉威，〈商而優則仕——南洋富商張弼士出任檳榔嶼首任副領事之探討〉，《海華與東南亞研究》，2：3(2002/7)，頁93-112。

¹⁸ 例如19世紀最後的10年中，清政府派往新馬地區展開鬻官活動的官員，由於受到派駐當地的領事(包括新加坡總領事和檳榔嶼副領事)與著名僑領的協助之下，皆取得不錯的成績，主要是領事們或當地著名僑領，都能以他們在當地華人社會的聲望和影響力，說服了許多富商捐官買爵，尤其是張弼士，更功不可沒。顏清湟[著]，張清江[譯]，〈清朝鬻官制度與星馬華族領導層(1877-1912)〉，收錄於柯木林、吳振強編，《新加坡華族史論集》(新加坡：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1972)，頁57。

¹⁹ 在清政府的經營和努力之下，檳榔嶼僑社中有不少富商是偏向清政府，而排斥革命黨人。有關此方面的討論已有研究成果，在此不擬贅述，有興趣者請參閱：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張少寬，《孫中山與庇能會議：策動廣州三、二九之役》等專著。

²⁰ 黃福鑾編著，《華僑與中國革命》，頁71。

²¹ 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頁259。

章、章炳麟二人失和所致。²²雖然陶成章和章炳麟的「倒孫運動」失敗，但是大部分南洋的同盟會領袖，卻對陶、章二人的舉動保持緘默態度。至於新加坡和馬來亞華僑革命同志的態度表現如此沉寂，極可能暗示他們認同陶、章二人對孫中山的若干指責。然而，他們並不願見到同盟會因而造成嚴重分裂，以致對上述事件的採取較保守甚至消極的態度。²³

無論如何，「倒孫運動」事件對同盟會新加坡分會的打擊，以及對當地革命運動的發展，皆已造成嚴重創傷。因為許多過去熱心支持革命事業的新加坡同盟會領袖，皆採取較消極的態度，有者甚至不太願意繼續捐獻款項支持革命。²⁴此舉影響頗大，造成新加坡的革命活動陸續停辦，其中最遺憾的，即當地兩個革命黨的宣傳咽喉，「開明演說書報社」和《中興日報》，就因無法籌集經費運作，而分別在1909年底和1910年初，先後宣告關閉與停刊。²⁵

職是之故，孫中山爲了革命經費的問題，甚至前往歐美等地尋求殖民政府貸款，以支持革命所需的經費，惟多以失敗告終。此外，孫中山深知美國華僑亦多少受到陶成章和章炳麟二人言論的影響，於是亦致函美國革命黨所辦的報紙，說明「倒孫運動」的始末，以揭發陶、章二人對其蓄意中傷的惡毒目的。所幸孫中山此舉尚獲得美國華僑的支持，甚至在美國設置同盟會分會。²⁶在革命經費暫時有了著落之後，孫中山亦了解到新加坡的革命事業將難以持續下去，爲此，在重抵新加坡之前，就已經擬定好改組南洋同盟會的計劃。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改革，就是決定把同盟會在南洋的重心北遷至檳榔嶼。

另一方面，英屬海峽殖民地政府亦日益加緊對新加坡革命黨的監視。英屬海峽殖民地政府態度的轉變，主要是從越南撤退而來的革命份子相當複雜，經常在新加坡惹事生非，擾亂當地的治安和秩序，導致當地百姓日漸排斥革命黨人。²⁷因此，爲了解決當地治安問題，英屬海峽殖民地政府遂改變對革命黨的態度。此外，在清廷領事不斷

²² 由於參加革命的人出身各異，以致見解尚有很大的差別，內部難免發生衝突而使革命陣營逐漸演化。例如，孫中山主張以三民主義作爲革命的目標，而章炳麟則專倡排滿，對於建設共和政府則持保留態度。雖然都是揭示排滿革命，但在歸趨上則各自強調各自觀點，導致日後的矛盾埋下伏筆。孫中山與陶、章之間失和的導火線，則與經費脫離不了關係。因爲推動革命所需經費龐大，無論是向華僑或外人募集，籌款皆極度困難。1907年日本政府在清政府的壓力下，勸請孫中山離境，並贈予旅費，孫氏除了將款撥給《民報》，並與黃興、胡漢民等人攜至南洋各地活動，充作革命費用，章炳麟大表反對，東京同盟會內部的矛盾遂現。支持章炳麟的陶成章在南洋活動時，由於向孫氏索取經費不成，以致公然抨擊，使孫氏不得不請人出面調解。詳情亦可參閱：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与辛亥革命》，頁233-240；張少寬，〈南洋總機關移設檳城〉，收錄於氏著，《孫中山與底能會議：策動廣州三、二九之役》，頁49-50。

²³ 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与辛亥革命》，頁243-244；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冊(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4)，頁652。

²⁴ 最明顯者，首推陳楚楠和張永福二人，由於對陶成章和章炳麟二人的處境深表同情，間接影響到他們對革命運動的支持態度。此外，歷年出錢出力亦深感疲憊力竭，加上諸次起義的失敗，在在使得他們心灰意冷。

²⁵ 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与辛亥革命》，頁244。

²⁶ 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与辛亥革命》，頁250-251。

²⁷ 例如此批革命份子就曾結黨打劫殺人，深爲英國海峽殖民地政府所不容，並大事逮捕此批滋事份子，予以監禁與驅逐出境，結果導致革命黨人不被當地人民信任，以及爲社會人士所敵視。歐陽昌大，〈新嘉坡華人對辛亥革命的反應〉，頁94。

要求干涉革命志士的行動下，英屬海峽殖民地政府亦爲了制止革命黨人，避免他們在當地建立基地或帶動群眾運動，進而加強對革命黨的監視活動。英屬海峽殖民地政府態度的轉變，無疑是害怕其本身利益受到危害。²⁸

由上觀之，無論是「倒孫運動」影響的內在原因，或是清廷領事的諸多打壓，以及英屬海峽殖民地政府對革命黨態度改變等的外在因素，皆迫使孫中山不得不慎重考慮把南洋革命重心遷往他處。至於選擇檳榔嶼作爲革命運動在南洋的重新出發點，而不選擇吉隆坡、怡保或芙蓉等地區，大致有如下的考量：

首先，孫中山當年選擇新加坡作爲同盟會在南洋的重心點，主要係考慮到新加坡地處南洋中心，同時，英國海峽殖民地政府的總部亦設在該處，使得當地擁有良好的郵政、通訊與銀行匯兌的設備。在理所當然的情形之下，新加坡就成爲南洋各分會的聯絡樞紐，並成爲與東京本部、香港或上海等分會取得聯絡的首選地點。²⁹因此，要取代新加坡成爲同盟會在南洋的新中心點，除了檳榔嶼，其他各地皆不具備上述的條件。檳榔嶼自1882年(光緒8年)以後，即有國際電報局，可直接與印度、緬甸等地區通訊；同時，亦可經由新加坡、馬六甲和歐洲及東亞各大城市的電報系統取得聯繫。更重要的是，檳榔嶼當時的郵遞與金融匯兌條件亦相當良好，對於革命運動所需的經費，亦可迅速在該地以電報匯兌款項至香港或上海等地，以支持正在進行中的各項革命活動。³⁰其次，由於檳榔嶼和新加坡同屬英國海峽殖民地的轄區，所以新遷至此的同盟會南洋支部，無需爲適應新環境而作較重大的改變。³¹此外，同盟會檳榔嶼分會的成員，較少受到陶、章二人「倒孫運動」的影響，以致當地的同盟會領袖(吳世榮、黃金慶和陳新政等人)，依然積極參予和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³²最明顯的表現，就是自陶、章二人「倒孫運動」事件之後，新加坡的「開明演說書報社」和《中興日報》，分別在1909年底和1910年初，因無法籌集經費而宣告關閉與停刊；反觀，成立在檳榔嶼的「檳城閱書報社」卻屹立不倒，甚至還著手創刊《光華日報》以取代日益陷於困境的《中興日報》。³³原本對新加坡已感到失望的孫中山，在此種種有利條件的出現下，

²⁸ 英國海峽殖民政府對孫中山在當地的出現與活動，在政策上曾給予有限度的容忍。不過，隨著清廷領事不斷要求干涉下，以及發現革命黨人的活動對其政權會造成影響時，英人唯有採取新的行動。有關海峽殖民地政府對孫中山的態度演變，新加坡學者李勳圖有詳盡的論述，詳見：李勳圖，〈海峽政府對孫中山之態度〉，《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論文集》，頁164。

²⁹ 事實上，當年考量以新加坡作爲同盟會在南洋的重心點，尚與當地華僑的人數眾多有關。例如，當地華僑對於在1900年由康有爲所形成的保皇維新派，極力擁戴，並且捐獻大筆的款項以資助勤王之舉。此外，孫中山自1900年離開新加坡之後，即派尤列於次年抵新加坡組織中和堂招攬革命志士，而尤列在灌輸革命思想或進行革命行動上，都開創了先河，並獲得當地革命志士的支持，形成日後革命運動的重要基礎。黃建淳，《新加坡華僑會黨對辛亥革命影響之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1988），頁138-139。

³⁰ 顏清煌[著]，李恩函[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頁259-260。

³¹ 顏清煌[著]，李恩函[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頁260。

³² 顏清煌[著]，李恩函[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頁260。至於有關檳榔嶼的吳世榮、黃金慶和陳新政等人支持孫中山的論述，可參閱：陳偉玉，〈同盟會南洋支部領袖與辛亥革命〉（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1），頁59-70。

³³ 王慷鼎，〈獨立前華文報刊〉，收錄於林水檉等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1998），頁103。此外，按新加坡學者葉鐘鈴的研究，《光華日報》創刊于1910年12月2日，完全就是爲了配合

無疑是提供了一劑重振南洋革命事業的強心針。

然而，上述的兩大考量，其實只是部分原因而已。因為倘若將清政府派駐檳榔嶼副領事的因素，也一併列入觀察，無疑更能一窺其中的微妙之處。換言之，當時清政府派駐檳榔嶼的副領事，其對革命黨的態度與處理方式，無疑係使得檳榔嶼能成功繼新加坡之後，成為革命運動在南洋重新出發點的關鍵所在。因為相對於清政府其他駐外領事的咄咄逼人態勢，檳榔嶼副領事的應對作風和態度，無疑顯現得更為包容與溫和。³⁴例如，原為同盟會緬甸仰光分會所創辦的《光華報》，就是受到清政府派駐當地領事的迫害而停刊；反之，檳榔嶼的革命派人士卻能順利讓該份報紙，以《光華日報》的名稱在檳榔嶼創辦，實屬難能可貴。³⁵此舉，無疑更凸顯出檳榔嶼副領事對革命派活動的處理方式，實和其他地方的清政府駐外領事有著很大的差異。因此，孫中山決定把南洋同盟會的重心從新加坡北遷至檳榔嶼的考量，其中清政府派駐當地副領事的態度，實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關鍵點。³⁶

此外，除了上述考量，檳榔嶼的地理位置適中及交通便利，應該亦是促使孫中山把南洋支部遷往該處的考量之一。就20世紀初期而言，在航空業尚未發達起來時，輪船可說是當時極為重要的交通工具，而19世紀初就已開港的檳榔嶼，儼然成為輪船停泊的主要據點。³⁷因此，對於革命派人士的宣傳或連絡而言，無疑提供了交通上的極大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當時不僅將同盟會南洋支部從新加坡北遷檳榔嶼，同時也對黨務進行了一聯串的重大改革。³⁸孫中山此舉實給予中國革命運動重新賦予了一股動力。這可從1910年(宣統2年)以後，檳榔嶼革命黨領袖與中國革命運動的關係更邁進一步，同時更積極推動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中看出。其中「檳榔嶼會議」的召開，以及策

同盟會南洋支部自新加坡移駐檳榔嶼的形勢需求。葉鐘鈴，〈雷鐵崖與檳城《光華日報》〉，《亞洲文化》，26(2002/6)，頁124。

³⁴ 有關清政府駐外領事對反清份子在海外活動的打擊情況，詳見：蔡佩蓉，〈清季駐新加坡領事之探討（1877-1911）〉（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2），頁134-140；林遠輝，〈清代在世界各地設置領事問題初探〉，《華僑史論文集(第三集)》（廣州：暨南大學華僑研究所，1983），頁77-79。

³⁵ 林遠輝，〈清代在世界各地設置領事問題初探〉，頁79；程光裕，〈檳榔嶼僑賢陳新政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頁437-438。

³⁶ 相關討論，詳閱：張曉威，〈晚清駐檳榔嶼副領事之角色分析〉，頁270-273。

³⁷ 當時檳榔嶼和新加坡都有固定通往各地的輪船班次，對革命派人士在宣傳活動上，帶來極大的便利。關於當時輪船班次的訊息，皆可在當時的報章上獲得，例如在新加坡發行的《叻報》，以及檳榔嶼發行的《檳城新報》，皆有相關訊息刊載。

³⁸ 孫中山對於南洋同盟會分會的改革，除了把南洋支部北遷檳榔嶼，同時與當地同志商訂分會新章程，並規定支部常務委員會分成執行、財務、秘書、外交、教育、調查和交際等七個工作小組。每組工作人員約為五至十三人不等。每組主任按月集會一次，商討各項工作事宜。此外，對南洋各地分會發布任何命令時，均需要七組主任一致同意方能有效。至於調查和教育兩組的工作內容，則集中在考察各會員的品行，以及研究新的宣傳方法等。在此次的改革黨務中，孫中山對於會員的申請入會條件亦有所要求，即僅允許對於革命目標具有堅定信念者，方可在重新登記會員時被接納入黨，並且在成為新黨員時，必須在孫中山本人面前宣誓和簽名遵守黨章。無疑地，此舉主要還是為了避免類似陶、章二人主導的「倒孫運動」事件再次發生，而阻擾革命事業的發展。詳見：〈庚戌年（1910）檳榔嶼黨部改組為中華同盟會南洋總機關部職員及章程〉，收錄於張少寬，〈孫中山與庇能會議：策動廣州三、二九之役〉，頁187-188；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冊，頁655；劉世昌〈中山先生與南洋〉，頁62。

劃革命黨最激烈的一場戰役——「廣州三二九武裝起義」，即在在凸顯出檳榔嶼僑社與中國革命運動的關聯性。

三、檳榔嶼僑社對孫中山及革命運動的反應

自從同盟會南洋支部北遷檳榔嶼之後，檳榔嶼遂繼新加坡成為新的中國革命運動指導中心。此個新指導中心最具代表性的決策，即召開了「檳榔嶼會議」及策劃「廣州三二九武裝起義」。至於「檳榔嶼會議」之召開，其實是與兩件事情有關聯。其一，汪精衛和黃復生等人，因炸戴鴻慈失敗被捕入獄，³⁹消息傳到南洋後，黨同志馬上設法營救之；⁴⁰其二，孫中山、胡漢民等人，本來即為了解決廣州三二九武裝起義的經費，而準備到檳榔嶼募集資金。上述兩件事的「巧遇」，使得孫中山在1910年11月13日，招集大部分同盟會的重要親信在其位於柑仔園404號的寓所開會。⁴¹該次商討營救汪精衛等人，以及為廣州三二九武裝起義募款的會議，即史上所稱的「檳榔嶼會議」。⁴²

當時的參加者，除了黃興、胡漢民、趙聲、孫眉等人，檳榔嶼南洋支部的黨員代表吳世榮、黃金慶、熊玉珊、林世安等人，以及其他的南洋分會，如怡保(李孝章代表)、芙蓉(鄧澤如代表)等，均有代表出席。⁴³會議開始，孫中山即表明要籌劃重新發動大規模的革命行動。然而，大部分出席者皆表現出較悲觀的態度，主要還是受到汪精衛的起事不僅失敗，甚至遭到逮捕有關，再加上黨內的財政亦出現問題，在在打擊到黨員對於革命起義行動的信心，眾者「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⁴⁴所幸在孫中山的多番勉勵與激勵之後，終使黨員們對革命恢復信心，隨即在會議中商討起義地點、招納新會員之辦法，以及如何組織行動隊伍等必要事宜。⁴⁵

該會議之後，孫中山原擬遍歷南洋各埠，以便親自進行募款，然而卻遭到重重波折，例如荷屬東印度即拒絕他入境，而日本、越南和暹羅等國，亦早有禁止孫中山入

³⁹ 1910年3月，汪精衛和黃復生擬暗殺清政府實際掌握大權的攝政王，惟失敗被捕入獄，後被判終身監禁。詳見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二冊(台北：世界書局，1954)，頁230-254。

⁴⁰ 黃福鑾編著，《華僑與中國革命》，頁71。

⁴¹ 邱思妮[著]，陳耀宗[譯]，《孫中山在檳榔嶼》(喬治市：Areca Books，2008)，頁50。

⁴² 顏清湟[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頁265；劉世昌，〈中山先生與南洋〉，頁62；張少寬，〈廣州之役與南洋籌款運動〉，收錄於氏著，《孫中山與庇能會議：策動廣州三、二九之役》，頁44。

⁴³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第1編，第14冊(台北：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1964，第二版)，頁41。

⁴⁴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第1編，第14冊，頁41，44-45。

⁴⁵ 最後決定以廣州新軍為主幹，並挑選同盟會五百名同志為先鋒，擔任發難，至於籌款目標則訂為叻幣13萬元，以中國教育義捐為名，免除當地政府干涉的顧慮。此外，由於趙聲急需攬款返港為起義作準備，革命黨人於是在次日，即1910年11月14日在同盟會南洋支部(即今日打銅仔街120號，No.120, Lebuhr Armenian)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李本京，〈孫中山先生海外經費之籌集〉，《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2冊(台北：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1985)，頁243；邱思妮[著]，陳耀宗[譯]，《孫中山在檳榔嶼》，頁52。

境之令。⁴⁶不過，雪上加霜的是英屬海峽殖民地政府發出驅逐令，使得孫氏的募款計劃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礙。至於孫中山被驅逐出境的原因，可能與他曾在檳榔嶼清芳閣俱樂部的一次公開演講有關。因為該次集會上，孫中山不只發言要求群眾支持中國革命運動，同時指責清政府腐敗，而無意間亦攻擊到英國人在馬來亞的殖民政策。⁴⁷英屬海峽殖民地政府恐有礙於當地的治安，因而將孫中山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並限令孫氏必須離境。⁴⁸

雖然孫中山的離境讓募款計劃受到打擊，但是卻也可能因為孫氏受到不平待遇所致，更激發了南洋黨員對於革命運動的支持。就廣州三二九起義的募款成果觀之，整體而言，亦算是相當成功。其中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地區所籌獲的款項，就達47,000多元叻幣。⁴⁹無可否認，廣州三二九的大舉，革命黨人的確投入了全黨的人力與物力，而南洋華人的參與，無論是經費上的援助或是捨身就義的表現，皆是有目共睹。其中，參加廣州三二九起義的華僑，就分別有來自越南、緬甸、印尼、新加坡和馬來亞等地。他們之中有工人、農民、職員、教師、記者、商人、傳教士等，其中以祖籍廣東者佔大多數。⁵⁰

雖然廣州三二九起義最後以失敗收場，但是此役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因為它不僅震撼了大多數中國人的心，同時亦可說是直接促成「武昌起義」的火苗和種子，無疑為中國革命運動的最高潮揭開了序幕。

1911年10月10日爆發的「武昌起義」，可說是革命黨推翻滿清皇朝，建立中華民國的關鍵性一次革命行動，亦是對於滿清帝制政體歷次攻擊的總結果。⁵¹「武昌起義」的成功，全國起而響應，把滿清帝制政體推翻，亦算達成革命的目的。就整個革命的過程觀之，「武昌起義」是以前不斷的革命起義的結果，亦是中國南方多次革命所

⁴⁶ 陳新政，〈華僑革命史〉收錄於張少寬，《孫中山與庇能會議：策動廣州三、二九之役》，頁212。

⁴⁷ 該集會上，孫中山曾警告與會的群眾，如果歐籍人民在馬來亞繼續增加，使英國殖民政府認為可以取代各項華人服務的項目時，華人可能將自新加坡和馬來亞被排斥出去。顏清煌[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頁269。

⁴⁸ 英屬海峽殖民地政府甚至對孫中山所演說的內容，透過《檳城新報》1910年11月1日的報導而獲得摘要，並將之譯成英文寄至倫敦殖民部，以作為驅逐孫中山的證據。李勳圖，〈海峽政府對孫中山之態度（1900-1911）〉，頁176。

⁴⁹ 各地所籌款項(叻幣)如下，森美蘭18,600元、檳榔嶼11,500元、霹靂11,400元、新加坡3,530元、雪蘭莪1,551元、柔佛729元、馬六甲333元。事實上，從本次所籌得的款項中，亦可看出新加坡方面，在革命運動的熱誠上確已大不如前。關於該次募款情況，詳見：鄒魯，《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重慶：商務印書館，1939)，頁10，12-13；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中國同盟會》第1編，第14冊(台北：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1963)，頁51，55-56；陳樹強，〈辛亥革命時期南洋華人支援起義經費之研究〉，《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論文集》，頁250。

⁵⁰ 就72名烈士當中，南洋華僑佔了28人，其中來自新加坡和馬來亞者共有17名。楊慶南，〈新馬華僑對中國革命之貢獻〉，收錄於張希哲、陳三井主編，《華僑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04。此外，按張希哲的研究，在「廣州三二九起義」犧牲的烈士實為86人，而海外華僑共有31位，若將留學生亦視為華僑，則海外華僑則有39位。張希哲，〈關於「廣州三二九起義」及「黃花崗烈士」的幾點考訂〉，收錄於張希哲、陳三井主編，《華僑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05-206。

⁵¹ 辛亥十月「武昌起義」以前，革命黨大小舉事，前後凡數十次之多。黃福鑾編著，《華僑與中國革命》，頁208。

付出的代價所致。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南方的革命運動，多與海外華僑的參加與支持有關。尤其是「檳榔嶼會議」所策劃推動的廣州三二九起義，華僑不僅在經費上伸出援手，有者甚至直接拿起武器，參與當日的武裝起義行動，給予清政府一次強悍的攻擊，在在印證海外華僑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在籌備「武昌起義」期間，黃興就曾打電報至檳榔嶼同盟會南洋支部，請求捐助款項，當地領袖亦迅速匯了數千元叻幣至上海給黃興，而新加坡方面亦改採積極態度，參與了該次的籌款活動，以示對革命運動的支持。⁵²「武昌起義」爆發之後，檳榔嶼僑社對於事件的進展亦多所關注，尤其當地出版的《檳城新報》，即陸續報導和刊登相關的訊息。⁵³

就《檳城新報》的報導觀之，當地僑界對於「武昌起義」的爆發，初時並不抱以樂觀的態度。這可能係因為大多數人皆無法想像，自廣州三二九起義慘敗之後的短短數月以內，豈可能會再有一次如此龐大的起義行動。⁵⁴然而，當捷報陸續傳出之後，檳榔嶼僑社亦確實相信中國的新時代即將來臨。例如《檳城新報》在1911年10月14日的「言權」專欄中，就直言不諱地道出「以推翻滿族政府，為莫大之快事」的評論。⁵⁵

值得注意的是，不僅是檳榔嶼的僑社對於武昌革命的勝利消息表現狂熱，甚至在馬來亞其他地區，以及新加坡僑社亦感受到此股熱潮的威力。⁵⁶此外，在各同盟會分會的領導下，許多大規模的群眾集會亦紛紛召開，例如同盟會怡保分會，即在鄭螺生會長的主持下，於1911年11月2日召開大會，與會同志多達400多人，會中更有過去一向保守擁護清政府的僑商當眾剪去辮子，以示歸誠孫中山的革命事業。⁵⁷至於當日的重頭戲，則是與會中的50多人集體剪去辮子，作為一舉割斷滿清枷鎖的象徵。⁵⁸

另一方面，身在同盟會南洋支部所在地的檳榔嶼華僑社會，理當不會置身於此股熱潮之外。首先，在該年11月11日，由檳榔嶼同盟會領袖主持下，在平章公館舉行一場華僑大會，恭請各界人士出席，到場者多達千餘人。會中，黃金慶和邱昭忠二君呼籲各界人士大力捐獻以建設祖國，同時決定由全嶼各街道的代表組成募捐委員會，以便能逐戶的進行募款。⁵⁹其後，隨著陳新政公佈閩粵兩省的佳音，以及孫中山將再次來到檳榔嶼，皆讓當地僑社的情緒進入前所未有的高漲。⁶⁰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在平章

⁵² 楊慶南，〈新馬華僑對中國革命之貢獻〉，頁402。

⁵³ 該報自1911年10月12日起，即針對武昌起義的後續發展加以報導，甚至在社論一欄亦做了多次的評論。詳見《檳城新報》，1911年10月12、13、14、21日。

⁵⁴ 顏清煌[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頁278。

⁵⁵ 《檳城新報》，1911年10月14日。

⁵⁶ 《檳城新報》，1911年10月14、21日；11月3、4、6、7日。

⁵⁷ 胡子春即是此類南洋僑商的典型代表。胡氏當日非但剪去辮子，甚至率先捐獻叻幣5000元，以為支持革命的基金。《檳城新報》，1911年11月3、6日。

⁵⁸ 《檳城新報》，1911年11月3日。

⁵⁹ 《檳城新報》，1911年11月13、14日。

⁶⁰ 《檳城新報》，1911年11月14日；12月14、15日。